

收稿日期:2026-01-10

红色抗战家书中的家国情怀： 意涵诠释与现代传承

顾莉

(盐城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红色抗战家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高尚家国情怀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优秀传统家国文化的传承与升华。红色抗战家书以朴素温情的话语叙事,展现了共产党人舍家为国的民族大义、纯洁高尚的道德品格、向上向善的家庭风气和甘于奉献的使命担当。红色抗战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鼓舞斗志、凝聚力量、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仍具有深远意义。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通过系统性的征集、研究与传播,是深度实现红色抗战家书坚定信仰、砥砺品格、强化使命等育人价值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红色文化;抗战家书;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D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3-00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和发展研究”(24BKS156)。

作者简介:顾莉(1977—),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家风建设等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3.001

红色抗战家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革命、浴血奋战的真实记录与心灵独白,既承载着革命先辈对亲人的深切眷恋,又饱含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1]红色抗战家书所展现的家国情怀,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家国文化的继承,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家国观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自觉。新时代,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承和弘扬红色抗战家书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既是赓续红色血脉、坚定历史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凝聚奋进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一、红色抗战家书中家国情怀的生成机理

中华民族自古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民族面临危机的战乱年代尤为突

出。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重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此时保家卫国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和信念,中国人民的家国情怀达到了空前的高涨。红色抗战家书中家国情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下,对中华传统家国文化的传承与升华。

(一) 历史境遇:民族危难激发强烈的家国情怀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591}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代境遇激发了中国人强烈的家国情怀,红色抗战家书正是一种表达方式。家书虽然是亲人之间情感的传递,却也是社会现实呈现的特殊窗口,“从家书的实存形态来看,它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从家书的内容来看,它又是社会记忆的直接反映,或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资源,是一种记忆档案”^[3]。红色抗战家书真实地呈现了抗日战争这一宏大叙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在家庭成员间的细腻表达。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旗帜,领导团结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4]339}伟大抗战精神不仅体现在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场,也深深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流露在对亲人的挂念、慰藉与勉励之中。正如1937年4月10日,我党金融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高捷成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我自从‘九一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悲愤交集,誓不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之一人!”解释自己离家是因为“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而不是断绝人伦的无条件的弃家而不顾”^{[5]9-10},希望得到家人谅解。1943年5月,高捷成在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家书是个人情感最真挚的表达,也是对时代背景最真实的写照。红色抗战家书的作者有些是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些则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战士和工作人员,但他们的家书都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家人最为质朴却又浓烈的情感。“你二舅舅在打日本鬼子的最前线死去,他为救国而死,是死得光明的。”^{[6]107}“亲爱的,谁不愿骨肉的团聚,谁不留恋家庭的甜蜜。要知道国家民族重要,个人前途重要,因此又要别离亲人,而远征他乡了。”^{[7]75}“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5]75}一封封家书饱含着在颠沛流离后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更体现了舍家为国的决心、不怕牺牲的斗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国家罹难、民族危亡激发了深藏在中国人民内心深处最为强烈的家国情怀。

(二) 文化基因:传统文化孕育深厚的家国情怀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家国情怀,国是第一位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强盛就没有家庭的美满和个人的幸福。”^[8]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国古代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文化根基和精神血脉。红色抗战家书中的家国情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传承,是传统文化基因在抗战时期被激活和强化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

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470-471}。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家国情怀。

传统家国情怀是“以‘天下一体’为逻辑基础,以忠孝一体为价值凝练,以经邦济世为社会实践方式,追求‘天下太平’的价值理想”^[9]。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忠与孝具有一体性、共通性和同源性,家国一体、爱国如家、移孝作忠、爱民如子是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论语·学而》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悌是仁的基础,一个在家讲孝道之人,就不会轻易犯上作乱。对当政者而言“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对待父母孝顺,百姓就会忠诚,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是相通的。《礼记·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更是彻底打通了“天下一国一家一身”的序列壁垒,并认为“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礼记·祭统》),忠君与孝亲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这就为“移孝作忠”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孝亲可以外延为尽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所以,古代国家治理中就有了“人臣孝则事君忠”(《吕氏春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传》)的治国逻辑,孝也是对人进行道德考核及委以重任的关键标准。

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不仅一体、相通,在二者相冲突的特殊情况下,忠的序位要高于孝,国家利益要高于个人、家庭利益。《礼记》中讲“事君不忠,非孝也”,以此推断忠君即尽孝,当忠孝出现冲突时,选择尽忠就是行孝,而且是大孝,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言:“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所以,中华文化高度赞扬如霍去病“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博大胸襟和担当精神。这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将尽忠作为大孝的家国情怀,在传统家庭教育中也是予以传颂的。《晋书·列女传》中记载虞潭母孙氏在儿子准备兴兵讨伐苏俊时,告诫儿子:“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而累也。”并将家僮全部派去助战,出售自己环佩以作军资,并说服虞潭以其子楚作为督护,协同作战。《后汉书·范滂传》中记载范滂被捕下狱准备慷慨赴死时向老母亲表达不能尽孝,其母言:“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被世人评价为“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宋史》中记载,苏轼小时候由母亲程氏亲自教其读书,在读到《范滂传》时,苏轼问:“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在一代代的家庭教育中得以传承和发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10]也正因如此,在抗战时期涌现出一幅幅父子兄弟共赴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悲壮画卷。这种深植于中华血脉的“舍小家为大家”的文化基因,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成为凝聚亿万人心、铸就民族尊严的精神支柱。

(三) 思想指引:科学理论铸就崇高的家国情怀

红色抗战家书与其他抗战家书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具有的人民性和崇高性,即不仅要救国家于危难、寻求民族独立,更将实现人民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终极追求,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崇高的理想信念。“红色文化概念的内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过程中凝聚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遗存和红色精神。”^[11]红色文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根本价值立场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立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革命性和先进性。作为红色文化形态之一的红色抗战家书,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浸染了红色文化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追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红色抗战家书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定意志上,更体现在矢志追求人民解放的崇高信念上。1937年,赴延安参加抗大学习的韩雅兰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应走自己应走的道路,光明的有真理的道路。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子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事业。”^{[12]8}1939年11月28日,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秘书胡孟晋即将返回前线,在给妻子张惠的辞别书中写道:“惠,最亲爱的人,你是妇女中的先进者,对于我这次的外出,请不要依恋,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的抛弃你,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啊!”他不仅开导妻子要理解自己为了革命而离开家庭,还鼓励妻子多读书报、学习进步知识,以及组织、宣传、教育其他妇女,“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亦更加努力呵!”^{[7]75-76}胡孟晋还细致地帮妻子草拟了《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和《讲演注意事项》,运用自己积累的新四军革命宣传工作经验,帮助和指导张惠开展妇女抗日爱国运动。1940年,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金方昌,在被害前一天,借着月光用铅笔头在纸烟盒上写给哥哥们的绝笔信中提到,“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说“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并要求哥哥们“把咱们弟弟、侄侄们都能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5]104}。这些红色抗战家书的作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抗日救国的胜利,更是人民解放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他们的言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践行和坚守。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都重视集体本位和社会本位,将群体价值、社会价值置于个体价值之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够得到很多仁人志士深刻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集体是“真实的共同体”,而不是与单个利益相脱离的“虚幻的共同体”^{[13]164}。马克思主义与之前所有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不同的是,“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14]8}。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下的家国情怀已经超越了爱国等于忠君的传统思维,而是上升为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伟大事业。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15]7}忠孝的内涵也不再是传统伦理语境中的下对上的顺从,而是融合了为无产阶级乃至人类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在传统文化中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往往比作父子关系,如“爱民如子”“父母官”等,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视野里,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才是要尽忠的对象。毛泽东提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6]1094},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7]714},习近平强调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18]428},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家国观的话语表达,既饱含传统家国情怀的深厚情感,又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升华和超越。

二、红色抗战家书中家国情怀的内涵意蕴

红色抗战家书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写给亲人的家信,内容朴实、通俗易懂,虽然有些家书因为作者出身穷苦大众文化水平不高而出现错别字、语句不是很通顺等问题,但它们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具有深刻的内涵意蕴,概括起来看,主要包含面向个人、家庭、国家三个维度的价值叙事和思想表达。

(一) 面向个人维度:涵养纯洁高尚的道德品格

纯洁而高尚的思想品格和人格修养是家国情怀最基本的道德前提。家书是人与人之间私

密的信件往来,有些是作者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道德品行,也有些是通过作者对收件人的道德要求、价值指引和行为规劝间接反映作者的思想品格和道德境界。无论是哪种方式,在红色抗战家书中,读者都能感受到书写者高尚无私的人格追求、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毛泽东在1941年写给毛岸英和毛岸青的信中说:“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30}强调学好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对如何学习做了详细的指导和规划。申耀东烈士在给妻子的信中讨论了“立大志”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人云百年树人,我知终身树志。志在何方,终身见之;志在何事,终身行之;志可有节,困难试之;志可有价值,大评议之;志为立身之本,事业之本,人生要有意义,志在脑中不可须臾辞也”^{[20]147},期望妻子能树立远大的志向,以求共同进步。史钦琛烈士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儿为了无产阶级及中华民族的解放,终身献于革命事业”,并请求母亲对他的儿女要“多加教育,培养成人,供〔贡〕献社会”,同时“对邻居要和睦,对劳动者应各方从宽,以济贫困”^{[5]99-100}。体现了坚贞的革命信仰和对社会、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胡孟晋在给妻子的辞别书中写道:“人生是要做伟大事业,而不是做了金钱的奴隶呵!”^{[7]76}并叮嘱妻子对穷人要客气、要有同情心,对太看重金钱的人不要与之来往,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红色抗战家书中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品质,这种道德品格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志存高远”“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等优秀文化基因,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者崇高的无产阶级道德境界。“道德”一词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以指导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为目的的精神”^{[21]54}。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道德产生于一定社会关系又通过指导人的行为实践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红色抗战家书中蕴含的道德品质之所以纯洁高尚,是因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站在了无产阶级立场上,真正将人民群众作为主体,以人民的真实需要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即通过伟大的革命事业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通过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来服务社会,改造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当为之持续奋斗的目标指引。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是新时代对时代新人提出的道德要求,而红色抗战家书中的家国情怀就是其生动诠释,撰写家书的革命者们更是用坚贞不屈、艰苦奋斗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

(二) 面向家庭维度:培塑向上向善的家庭风气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教家风,良好的家庭风气是个体道德品格养成的重要因素。同时,良好的家庭风气也需要家庭成员的共同维护,尤其是关键家庭成员的价值引领和榜样示范作用。抗战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就通过家书向家人们传递了先进思想,为其他家庭成员指引了方向、树立了榜样。1933年,周执中的二弟在抗日前线牺牲,周执中从外甥的信中得知父母整日以泪洗面,但自己不能回家安慰父母,就写信给外甥,请他在暑假中“常常同你爹爹和妈妈到我家里去,替你舅舅安慰安慰外祖,并且请你和妹妹、弟弟常常做些活泼天真的怪象以博他们破涕欢笑”^{[6]107},并鼓励外甥要努力读书,长大后完成舅舅的遗志。家书中既流露了作者期望对父母尽孝的拳拳赤子之心,更表达了殷殷爱国之情。1938年,共产党员王孝慈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我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我们要在敌人的炮火下壮大起来。抗战是我们的神圣职责。”^{[7]55-56}他在信中赞扬儿子俊安在抗战中“至死也不愿退过黄河”的不怕牺牲的精神,鼓励弟

弟“勇敢的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7]55-56}。在王孝慈的感召下,儿子、弟弟相继投入抗战洪流,谱写了父子并肩作战、兄弟共赴战场的雄壮战歌。1941年,彭雪枫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写道,无产阶级的爱情“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同样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经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谈心,月下互勉,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双方的前途!”并建议要“把功夫用在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相互鼓励上”^{[20]152-155},这样感情才会越来越浓。1944年,在延安学习的茅盾女儿沈霞在给父母的信中也提到自己对爱情的看法,“对于我俩的共同生活,我们一致认为是建立在共同的进步上的,是建立在共同的事业上的”^{[22]228},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于男女平等地位的志同道合、积极向上的爱情观。

抗战时期很多革命者不得不背井离乡投身保家卫国的战场,他们借助一封封家书叮嘱家人、教育子弟。家书既是亲人间思想交流的纽带,更是培塑良好家风的重要载体。“家风的形成离不开父祖的提倡和身体力行,也离不开后辈子弟的继承和发扬。”^{[23]419}一般而言,在文化传承稳定的社会,家风的形成是长辈向晚辈进行正向输导,而在新思想新文化不断涌现的社会动荡时期,家庭成员中接受新思想熏陶的晚辈也会对家庭风气发挥文化传输的作用,将新的社会风气引入家庭,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思想和行动,即文化学中的“同喻文化”和“后喻文化”^{[24]12}。所以,一个家庭的家风走向,主要看其核心家庭成员具备何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以及对其他家庭成员进行怎样的引领。红色抗战家书的作者大多是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爱情、婚姻、家庭的高尚价值追求。他们以先进的政治觉悟、思想文化和革命行动,引领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家庭形成向上向善的良好家风。

(三) 面向国家维度:锻造甘于奉献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4]337}面向国家维度中的救亡图存的责任担当、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前赴后继的革命勇气,是红色抗战家书最鲜明的特色。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寇押往珠河,在火车上给年幼儿子的遗书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孩子呵!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5]6}以自己为国捐躯的行动为儿子树立了榜样。1939年,旅居菲律宾的爱国华侨、共产党员王雨亭送儿子王维真回国去延安参加抗战,王雨亭在临别赠言中写道:“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盖了我们的民族意志”,叮嘱儿子要虚心学习、锻炼体魄,“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7]187}父亲王雨亭在海外为抗战创办报纸、奔走呼告,介绍上百名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到延安参加抗战,儿子刚满15岁就在父亲支持下奔赴延安并在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到1947年才得知父亲共产党员的身份,父子二人共同为民族解放作出了贡献。

爱国主义既是一种对祖国热烈而真挚的情感,更是一种甘于为祖国奉献自己的担当和作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内心信念,始终激励人们把祖国的兴亡与自身联结在一起,每当发生对祖国的侵害行为时,就会表现出坚强卫国的精神。”^[25]在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舍家为国、舍身救国的视死如归和坚贞不屈,是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家族利益之上,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价值选择。这既是一个优秀道德品格最高层级的表征,更是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深度认知。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兴亡与每个人休戚相关,国家强盛人民才能幸福,也只有人民不懈奋斗、甘于奉献,国家才能走向强盛。因此,“兴国”“强国”是每个国民美好的愿景更是每个社会成员

应尽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的新时代,每一个体都应是民族复兴的贡献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者,“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胸怀全局,自觉把人生态度、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26]。家国情怀始终是个体、家庭与国家、民族的高度统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表现在甘于在各行各业尽心尽力、求真务实、勇于担当,一生为祖国无私奉献。

三、红色抗战家书中家国情怀的现代传承

红色抗战家书不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鼓舞斗志、凝聚力量、指引方向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仍具有坚定信仰、砥砺品格、强化使命的深远意义。红色抗战家书中的家国情怀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需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渠道进行深度挖掘、大力弘扬和赓续传承,充分发挥其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价值。

(一) 家庭引导:铺设家国情怀的情感根基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个场所,对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良好的家教家风是培育家国情怀的首要环节。中国古代就非常注重家庭对个人品行的影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开篇第一段就指出,“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鬪,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家教家风的引导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方式都难以替代的。家庭教育的关键是对孩童的早期引导,在幼儿时期就播种下家国情怀的情感种子,并使其在心灵深处生根发芽。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儿童教育时就讲,“我们要特别注意,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27]73-74}。红色抗战家书的背后蕴含着大量高尚的故事,它们感人肺腑、情真意切,有些荡气回肠,有些催人泪下,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会为之动容,是家长培养孩子高尚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优质资源。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自觉树立培育子女的家国情怀,在品读红色抗战家书中,主动挖掘其中的精神密码,并用贴近时代和青少年的话语形式,引导子女正确认识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理解革命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历史责任感。家长可以和子女一同欣赏主流媒体录制和播出的电视节目或微视频,如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家书——四万万人的抗战记忆》、光明日报社的《跨越八十年的光明家书》、央广网的《理响中国·烽火丹心》AIGC系列微视频等,在融合泛黄的家书图文、黑白影像、诵读、配乐、AI场景再现等多维叙事的沉浸式体验中拉近子女与历史的距离,潜移默化地厚植子女的家国情怀。同时,家长还可结合重要节日、纪念日,如清明节、抗战胜利纪念日等,带领子女前往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实地瞻仰先烈、聆听故事、触摸实物、仪式互动等具身体验中激发情感共鸣,感悟先烈的忠诚信仰与家国担当。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家长应以身作则,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敬业奉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国家的热爱与责任担当,让子女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真正实现从情感认同到行为自觉的升华。

(二) 学校教育:筑牢家国情怀的理性认知

与家庭教育相比较,学校教育具有目的性、系统性、专业性等特点。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学校应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具有崇高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红色抗战家书因其鲜明的政治立场、高尚的人格力量、浓郁的情感叙事,是学校爱国主义教

育的优质资源,应当将其充分开发利用好,有效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借助科学的教育方法,在深化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厚植家国情怀,发挥其铸魂强基、凝心聚力的重要价值。

学校可将红色抗战家书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生动题材,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校园文化等各环节。首先,将历史文本资源转化为课程教学资源。不同学段、不同课程应以育人目标为靶向、以学生认知规律为遵循,深度挖掘红色抗战家书中的育人元素,并进行適切性改编与教学化处理。例如,思政课聚焦家书中蕴含的理想信念、革命精神与价值追求,增进学生政治认同和责任意识;语文课可侧重家书语言的情感表达与人文内涵;历史课通过家书还原历史场景,深化对党史国史的理解等。在数智时代,还可通过跨学科协作将红色家书与艺术创作、数字技术融合,开发数字家书馆、建设虚拟现实体验场景、打造沉浸式互动课程资源,使红色抗战家书活化为可听、可视、可感、可触的数字化育人资源。其次,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升教育实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家书诵读赏析、角色扮演、情景模拟、问题启发、议题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代入写信人或收信人视角,体悟家书中的家国情怀:可以借助AI生成与VR再现技术,让学生“穿越”历史现场,直观感受烽火岁月中的信仰与抉择;可以鼓励学生撰写“回信”或创作现代版家书,借助虚拟数字人技术,实现与先烈的跨时空对话,在创造性表达中内化家国情怀,推动情感共鸣向价值认同转化。在实践教学中,可开展“红色家书搜集”“寻访英烈后代”“口述史记录”等研学实践项目,让学生走进档案馆、博物馆、革命旧址或革命老区,搜集整理真实历史人物的家书资料,并通过撰写调研报告、制作微视频、举办主题展览等形式进行成果展示,在真实情境中深化学生对家国情怀的历史理解和现实体认。最后,学校还可将红色抗战家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家书诵读分享会、红色剧场、主题展览、主题班会、升旗仪式、广播站、宣传栏及新媒体平台等载体,营造浸润式文化育人氛围,打造数字校园文化,依托大数据分析 with 智能推荐系统,将家书故事、音频、影像按学段、兴趣、学习进度个性化精准推送到学生终端,构建全天候、全场景的红色文化育人生态。

(三) 社会弘扬:增加家国情怀的文化认同

家国情怀是社会个体对生养自己的故土家园所产生的浓烈的群体认同感、归属感和主体责任感、使命感。社会生活实践是厚植家国情怀的广袤沃土和源头活水,个体只有在积极的社会实践中才能感受时代脉搏、体验祖国变化、增进民族情感、积聚奋进力量,才能由情感基础、道德认知上升到行动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28]家国情怀需要个体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不断砥砺深化、持续增益,全社会应为个体家国情怀的升华和增进营造必要的外在环境。

在社会层面大力弘扬红色抗战家书中的家国情怀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党政机关的统筹规划、群众团体的共同参与、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等。首先,各级党组织应发挥主导作用,将红色抗战家书纳入主题教育、政治学习等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4]299},他本人也看了很多革命烈士留给子女的遗书遗言,认为这些“谆谆嘱托,殷殷希望,十分感人”^[1]。作为“关键少数”的党员干部应自觉传承红色家风,带头弘扬家国情怀,在重温家书中感悟初心使命。其次,博物馆、档案馆、党校、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应加强学术研究合作,抢救式广泛征集、梳理、保存红色抗战家书,并利用数字技术对家书进行高清扫描、语音转化与数据库建设,推动家书资源的共享与活化利用。再次,街道社区、各类群众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等,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礼堂等阵地,组织家书诵读、情景剧展演、亲子共读等活动,推动红色家书进社区、进家庭。最后,主流媒体机构应发挥传播主渠道作用,整

合新闻、出版、社交媒体等多种资源,形成协同叙事网络、用户参与的双向互动叙事和跨媒体叙事^[29],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及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兴媒介,全方位、立体化传播红色抗战家书中的感人故事与精神内涵,增强话语传播的覆盖面、吸引力和感染力。

四、 结语

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险而绵延至今,并能持续走向辉煌的精神支柱。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崇高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将中国人民凝聚成一股众志成城的御敌力量,激励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保卫和平、捍卫正义。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首次取得的反抗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从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转折,同时也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站在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宏观视角,抗战的胜利再次彰显了家国情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价值。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挑战,家国情怀作为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应得到传承和弘扬,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J]. 求是,2025(3):4-7.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张丁. 社会记忆视角下民间家书的征集与利用[J]. 档案学研究,2018(1):65-70.
- [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 重读抗战家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6]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 雨花英烈家书[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
-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8] 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N]. 人民日报,2019-05-15(1).
- [9] 张倩.“家国情怀”的逻辑基础与价值内涵[J]. 人文杂志,2017(6):68-72.
- [10]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11] 沈成飞,连文妹. 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 教学与研究,2018(1):97-104.
- [12] 张丁. 图说红色家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冷溶,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20] 本社. 革命烈士书信(续编)[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 [21] 罗国杰. 伦理学[M]. 修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2] 钟桂松. 茅盾和他的女儿[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 [23] 徐少锦,陈延斌. 中国家训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24] 米德. 文化与承诺[M]. 周晓虹,周怡,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2.

- [25] 陈来. 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J]. 哲学研究, 2019(10):11-19.
- [26] 习近平.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4-29(1).
- [27]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73-74.
- [28] 习近平. 在二〇一九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2-04(1).
- [29] 高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叙事研究[J]. 中国出版, 2025(16):31-34.

On the Patriotism and Familial Affection in the Family Corresponde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GU Li

(School of Marxism,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The patriotism and familial affection of CPC members were embodied in their family corresponde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t the crucial juncture bearing on the national destiny. The plain language and heartfelt diction reflected their devotion, virtue, enterprising spirit, sense of commitment. These letters fire up the morale, pooling the strength, providing directional guidance, bearing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education mechanism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we should collect, examine and promulgate the spiritual values in the correspondence, so as to fulfill their educational values.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e; family corresponden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atriotism and familial affection

〔责任编辑:王建霞〕